■ 往事回眸

宋中：中美“乒乓外交”的重要使者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本报通讯员 陈方明 尹崇任

40年前，小小乒乓球推动了中美关系“大球”，开启了中美关系40年的不平凡发展历程，并深刻改变了世界格局。

今年，正值中美“乒乓外交”40周年，中美双方都举办系列官方庆祝活动，纪念那段影响深远的历史。7月初，中国体育代表团专程赴美参加美方举办的纪念活动。

中美“乒乓外交”的实现，经历了颇多波折。时任中国乒协代主席的宋中，亲历这一事件的前前后后，并起到重要作用。生于1923年的宋中，是沾化县泊头村人，1989年因病去世。

1971年4月14日，周恩来总理会见来访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

宋中（右）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官员握手

1972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美国

总理决定参赛

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和一小批美国新闻记者抵达北京，成为自1949年以来第一批获准进入中国境内的美国人。

这次中美关系的“破冰之举”，成为一次轰动世界的大事件。中美两国20多年来人员交往隔绝的局面从此结束，中美和解随即取得历史性突破。

“小球”推动中美关系“大球”。1972年4月11日，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2月28日，中美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开始实现正常化。

在这次举世瞩目的“破冰之举”中，我省沾化人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71年1月，他刚刚调任国家体委国际司副司长、中国乒乓球协会代主席。

机缘出现在第三十一届世乒赛上。1971年3月28日至4月7日，第三十一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国际乒联和日本方面之前多次向中国队发出邀请。此前，中国队因“文革”等特殊原因缺席了第二十九届、三十届世乒赛。

1971年1月25日，日本乒协会长后藤钾二专程来京，力邀中国参赛。后藤钾二当时还担任亚洲乒联主席、国际乒联第一副主席。宋中负责接待后滕钾二并参与会谈。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还涉及到我国台湾问题，会谈曾一度搁浅。宋中及时请示周恩来总理，在周总理的亲自指导下，会谈得以顺利进行。2月1日，中日双方会谈纪要在北京签署。

中国乒乓球队随后马上进入紧张的赛前集训。值得一提的是，这件事情发展还是一波三折。由于当时国际国内政治形势极其严峻，日本右翼反华势力、台湾国民党特务的活动猖撅，国内对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是否赴日参赛仍然存在争论。

最后关头，周恩来总理决定参赛。他认为，中国要信守诺言，如不去参赛，将失信于人，还会增加以后参加国际比赛的困难。毛泽东主席批示同意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开始了这次震动世界的旅程。

机缘巧合“破冰”

1971年3月21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一行由团长赵正洪、秘书长宋中率领，从香港乘机飞抵日本。中国乒乓球代表团以良好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赢得广泛赞赏。

共同社的报道中说：“相隔五年来到日本的中国代表队，连日来和各国代表队进行比赛和联欢，展开了‘体育外交’，成了轰动大会的主角。”“中国代表团的体育外交不仅指向日本，而且同参赛的各国代表团进行多方面的交流。同和中国未建交的国家的代表团也不断进行联欢。”并特别指出，中国代表团的表情总是非常明朗，谈话非常坦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中美关系“破冰”，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呈现出积极迹象。

3月27日晚，中国队在参加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一次招待会时，中美两国运动员不期而遇，当时双方互打招呼。中国代表团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些信息。次日，中方代表团的负责人通过国际电报向北京报告：“美国队的人和我们接近，讲了很多话。”

世乒赛举行期间的3月30日，在国际乒联会议上，宋中当选为国际乒联执委。此前曾与宋中交谈并表示希望访问中国的美国代表团成员哈里森，上前表示祝贺时，再次表达访中愿望。

非常巧合的是，在国际乒联大会期间，宋中无意中与美国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坐到了一张桌子上。斯廷霍文有意提醒宋中，15天前，美国国务院决定对持有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员取消一切旅行限制。

中午散会后，他们两人又走到一块，斯廷霍文委婉地表示：“听说中国方面已邀请了南斯拉夫乒乓球队在世锦赛后访华一周。中国乒乓球运动水平很高，如果美国选手去一次中国，一定能学到许多有益的技术。也希望中国的乒乓球队选手到美国去。”

当天晚饭后，在宋中的主导下，代表团7位党委成员经过商量后，得出结论：“美国乒乓球队表示友好，他们想去中国访问。”他们向北京报告了这一重大消息，4月3日，报告呈报周总理。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国内决策层认为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现在访华时机还不成熟”。

随后发生的事情，相当多的人已经比较熟悉。一次看上去很平常的“意外邂逅”，改变了历史。

4月4日，美国乒乓球运动员格伦·科恩，从练球场去往体育馆的途中，错过了接送车。中国代表团专用车正好路过，中国运动员主动向他打招呼，格伦·科恩搭乘了中国代表团的车。

在车上，格伦·科恩与中国乒乓球运动员进行了友好交流，庄则栋还向他赠送了礼物。第二天，格伦·科恩专门在赛场外等待，向庄则栋回赠礼物。

这一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引起轰动，同样引起国内高度重视。与此同时，中国队表现优秀，在赛场夺得了4项冠军，极大鼓舞了人心，提升了国家形象。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尤其是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运动员“巧遇”一事的反应，4月6日晚上，毛泽东经过反复斟酌，最终作出“邀请美国队访华”的决定。

“小球”改变世界

4月7日上午，宋中口头将访华邀请通知哈里森。

美国方面，代表团马上通过美国驻东京大使馆，将这一消息报告给尼克松总统。尼克松总统很快批准接受邀请。

当天下午，宋中就与斯廷霍文、哈里森展开会谈，确定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时间、日程、路线等细节。

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一行25人，在团长斯廷霍文率领下抵达北京，成为1949年以来第一批获准进入中国的美国人。这一事件，翻开了中美关系历史新的一页。

4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美国乒乓球队时说：“你们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关系上打开了一个新篇章。”

而哈里森所期待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美，很快就成为现实。宋中当时是双方主要的联络沟通人员。1972年4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一行12人，实现了对美国的回访。

“乒乓外交”成功推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并深刻影响了世界格局，从而成为“体育外交”的典范事件，至今广为称道。

今年是“乒乓外交”40周年纪念，中美双方都举办系列庆祝活动。7月1日至7月9日，中国乒协代表团由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蔡振华率队，赴美“故地重游”，在密尔沃基、旧金山和洛杉矶举行三站活动，与美国的“老朋友”一道，纪念中美乒乓外交40周年。

出访美国的中国代表团一行17人中，梁戈亮、郑怀颖、杨俊是1972年随中国乒乓球队访美时的老将，是“乒乓外交”的亲历者；正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读书的两届奥运会冠军张怡宁，去年从美国学成归国的世界冠军刘国正，称得上是“乒乓外交”的受益者；还有两名国青队小将赖佳新、张蔷，则寓意中美乒乓友谊代代相传。

除在美国举行的活动外，由中方主办的系列纪念活动将于10月底在杭州等地举行，美方已接受中国乒协的邀请。

如今，“乒乓外交”推动的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个国家及民间交流正日益扩大。作为“乒乓外交”的亲历者和积极推动者，相信这也正是宋中所最期待看到的。

·相关链接·

宋中的“体育外交”

□ 于国鹏 整理

除了积极推动并实现“乒乓外交”，宋中对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宋中，原名锡英，号春堂，山东省沾化县泊头村人，生于1923年5月。从军多年以后，1971年1月，调任国家体委国际司副司长、中国乒乓球协会代主席，亲历而且推动了中美“乒乓外交”的实现。

中美“乒乓外交”的重大历史意义已无须多言。今年，正值中美“乒乓外交”40周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赴美参加纪念活动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专门于7月4日致信祝贺，贺信中评价说：“40年前，中美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和政治家以非凡的战略远见和高超的外交艺术，用小小银球推动了中美关系的‘大球’，不仅开启了中美关系40年不平凡的发展历程，而且深刻改变了世界格局，给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了福祉。乒乓外交已成为在中美两国人民心中留下美好而永久记忆的一段佳话。”

日本世乒赛后，宋中又组织了多次“乒乓外交”活动。1972年5月，亚洲乒乓球联盟成立，宋中任秘书长。次年8至9月，他组织举办北京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有86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队参赛，盛况空前。

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也是宋中“体育外交”的杰出成果。1974年，宋中出任国家体委国际联络司副司长、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秘书长，开始致力于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及其他单项国际体育组织中合法席位的工作。宋中率团四处拜会国际奥委会委员争取支持。在宋中、何振梁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先后促成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国际奥委会副主席萨马兰奇成功访华。

1979年，宋中又率团赴法国、瑞士，为中国重返奥委会做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工作，经过“舌战群儒”式的较量，赢得了多数委员的尊敬、理解和支持。

1979年10月23至2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召开会议，讨论恢复我国席位的决议案，最终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承认中国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允许台湾以“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名称参加奥运会。11月，国家体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庆祝会，邓小平、邓颖超等出席。邓颖超在讲话中宣告：“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登上了世界体育舞台。”

1989年9月21日，宋中因病去世。

从事体育工作以来，宋中以出色的业绩获得多项重要荣誉。1983年3月获国家体委最高荣誉奖“体育运动荣誉奖章”。1984年被亚乒联授予亚乒联终身名誉主席称号。1990年9月被国际乒联执委会授予国际乒联金质奖。

李希霍芬带山东走进西方视野

□ 本报通讯员 孙保锋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丁培华

7月15日，青岛市档案馆迎来了建馆50周年纪念日。在档案馆数万件馆藏资料中，绘制于1885年的《山东东部地图》是馆藏年代最早的地图。120多年前，德国地理学家斐迪南·封·李希霍芬在柏林出版了《中国地图集》。这部包含54张中国行省地图的巨著，为李希霍芬赢得了国际性的学术声誉，而其中的《山东东部地图》，正式宣告了山东第一次以近代科学测绘地图的方式，走进西方世界。

李希霍芬和他的《山东东部地图》

得来不易的中国之旅

李希霍芬是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近代早期中国地理学研究专家。1833年5月5日生于普鲁士上西里西亚卡尔斯鲁赫(今属波兰)，1856年毕业于柏林大学，曾任柏林国际地理学会会长、柏林大学校长、波恩大学地质学教授、莱比锡大学地理学教授等，1905年10月6日在柏林逝世。他于1877年-1912年撰写出版的《中国》(五卷，附地图集两卷)一书，是第一部系统阐述中国地质基础和自然地理特征的重要著作。李希霍芬的研究范围也在书中进一步地细分，从中国到华北到山东青岛，最终绘制出山东地形和地质图，并将胶州作为矿产资源宝地和战略要地进行重点描述，这也使学术界一度认为李希霍芬对胶州的研究是科学光芒与侵略野心互相影响下的产物。其间，李希霍芬对中国特别是山东的考察在政治和地理研究的长河中留下了灿烂的一笔。

作为亚洲研究热的两位中心人物——亚历山大·封·洪堡和卡尔·里特尔的后继者，李希霍芬闯进柏林学术圈不久，便将目光投向了神秘的中国。1861年3月，李希霍芬随弗尤伦伯格伯爵率领的普鲁士使团抵达天津，这个首次造访中国的德国使团带有一份秘密使命，就是效仿英国，得到一块类似香港的海军锚地和商业港口。当时锁定的目标是台湾，而李希霍芬这位年轻地理学家的职责就是实地勘测、以咨选址。

李希霍芬在台湾海峡的飓风季中出色完成勘测后，给内阁呈交了包含诸多可靠数据和理论分析的考察报告，对台湾称赞备至。但尤伦伯格的意见则恰恰相反，认为季风中的台湾岛根本找不到一处锚地，不宜建港。尽管这份考察报告无疾而终，李希霍芬在遗憾、愤懑和感叹中退出使团，但他依然收获了“触摸”中国的第一手资料，并且宿命般地将自己中国研究的学术生涯与德意志的海外扩张捆绑在一起。

李希霍芬希望开展独立研究的中国之旅，但却经历了两次挫败。1862年，李希霍芬试图由南亚迂回进入中国，然而承诺资助他的汉堡银行家在其一切准备就绪时突然毁约，这位银行家认为李希霍芬已经退出普鲁士使团，不再能代表国家利益。南线受挫后，李希霍芬赴加里福尼亚考察美国西部矿业。在那里，他萌生了第二条考察中国的路线：从加里福尼亚出发，经堪察加半岛抵西伯利亚，从北亚绵长的边境线进入中国。然而，没有人愿意陪伴他穿越寒冷的西伯利亚和无垠的蒙古沙漠，甚至他的朋友——俄国地质探险家彼得·谢苗诺夫都反对他尝试做一次“无谓的自杀”。退一步说，即便有向导，有同行者陪伴，沙皇的巡逻兵也不会轻易放过一个异国人经由他们的国土踏入国土之外的另一块“领地”。

北线无望而情绪低落的李希霍芬未曾预料，他对于加里福尼亚采矿业的考察研究，获得极大成功，加里福尼亚的银行家们立马看中了这个“能猜透西部秘密的普鲁士人”，将他们开发中国新大陆的商业筹码押在他的身上。

1868年，获得资助的李希霍芬从上海开始了他独立研究的中国之旅。他的足迹遍及中国当时18个行省中的13个，溯运河北上，历江浙、抵京津、赴满蒙、出陇海，纵横大半个中国，考察了欧洲人几乎从未涉足、更谈不上进行过科学考察的广大中国腹地。不用说在当时，即使在将近一个半世纪之后的今天，李希霍芬也是在中国版图上走得最远的外国人之一。

难以抗拒的“山东诱惑”

此次中国之旅对于李希霍芬的学术生涯意义非凡，从1871年他在欧洲杂志《地理学报告》上发表第一份考察报告，到五卷本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的出版，可谓硕果累累。他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最早向世界介绍了都江堰工程，第一个发明了“震旦系”、“五台系”等地层术语……不过，成就他学术和政治双重角色的最重要原因，是他的山东考察。

李希霍芬于1869年3月踏上齐鲁大地，开始了3个月的实地勘测。山东的富庶使李希霍芬惊喜不已，在他眼里，半岛以西的广大腹地，宛如一条飘逸的黑绸带，上面缀满乌黑闪亮的煤和铁。沿坊子、博山一路西行，形成年代相近的煤层连绵不断，在博山以南，煤层又在黑色的山脊中起伏，矿脉时隐时现，向济南府方向延伸……博山城的路几乎是煤屑铺成的，大路扬尘，空气里混合着一股硫磺味儿。

李希霍芬不禁发出惊叹：浓烟冲霄的博山城“是我迄今看到的工业最发达的一座城市。所有的人都在劳动，都有活干。这个城市有着众口皆碑的工业城镇的声誉。这里的优质煤蕴藏在景色美丽的地方，这些煤很早就用于各个工厂，而这些工厂都有数百年的历史了……”

这样诱人的腹地自然引发了李希霍芬设计一个自由港和一条连接伸向腹地的铁路的构想：“胶州湾的开放和上述与内地连接的交通线的开辟，是山东丰富的煤矿资源的前途所在，即使中国在物质上、科学文化上和工业生产上的崛起直接违背欧洲先进工业国的利益，但这是必然要出现的一种发展趋势。鉴于这种情况，外国列强必须保证自己在这一即将到来的大发展之前得到尽可能多的好处……”对于“得到尽可能多的好处”，李希霍芬的结论是：在胶州湾开辟自由港将成为“华北最大和最好的港口”、“是进入整个中国市场的一扇门户”。

在李希霍芬完成山东考察16年后，第一张以近代科学测绘技术绘制的山东地图——《山东东部地图》，出现在包括了第一张中国地图、第一张中国地形图、第一张中国地质图的《中国地图集》中。这部由54张比例为1:750000的地图组成的鸿篇巨制，是一整套解读中国的特殊语言符号，无怪乎西方世界惊呼“直观的中国从这里敞开大门”。在这次空前的直观描述中，青岛第一次进入西方社会的视野。它的名字出现在《山东东部(胶东)地图》上，当时标注在青岛方位上的只有崂山和浮山所。由于远距离描述的结果，图中标注青岛口的位置上出现了较大偏差。因为李希霍芬本人并未实地考察胶州湾，所以这张地图上的青岛给予世人的印象是朦胧而遥远的。尽管如此，青岛在西方文献中的初绽一笑，对若干年后德国海军选择东亚锚地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吹响占领青岛的殖民号角

掌握了中国的第一手地理资料，李希霍芬不仅在欧洲地理学界冠压群雄，在德国政坛上经过一番挫折后，也是地位日隆。他曾多次通过送达柏林的备忘录，向有“铁血宰相”之称的俾斯麦陈述占领胶州湾的建议，然而一贯奉行“大陆政策”的俾斯麦却未置可否。1890年，俾斯麦倒阁，即位不久的威廉二世开始由“大陆政策”向“世界政策”演变的新进程。这时，李希霍芬的备忘录才重新浮出水面，为激发德国对远东的军事野心并进而攫取胶州湾作为殖民地的扩张政策作了重要提示。实际上，在帝国海军部和外交部漫长的“选址”拉锯过程中，李希霍芬一直被奉为诠释中国的辞典和地图，“指向远东的臂膀和手杖”。他对选择青岛作为“军事基地和商港”的双重定位，被海军上将梯尔匹茨誉为“德意志帝国主义理论的创立”。

1897年“胶州湾事件”前夕，李希霍芬发表《胶州：世界的和可预见的意义》，以地理学家的身份吹响了占领青岛的殖民号角。1898年《胶澳租界条约》签订后，在《山东东部地图》基础上，李希霍芬又以1:1000000比例尺再次出版了山东地形图和地质图，并第一次标注了规划中的胶济铁路。身为第一张山东地图的绘制者，此时的李希霍芬真正看到了他曾用各种颜色标注在地图上的山东矿产资源，源源不断输入到德意志海外扩张的血液和肌体中。他的政治使命在《山东东部地图》那精心描绘的影像中，终有归宿。

“盖棺定论”褒贬不一

国人对于李希霍芬有着不同的看法。早年致力地矿学的鲁迅曾说：“支那大陆均蓄石炭，而山西尤盛；然矿业盛衰，首关输运，惟扼胶州，则足制山西之矿业，故分割支那，以先得胶州为第一着。”他认为：“自利氏(即李希霍芬)游历以来，胶州早非我有矣。”在鲁迅看来，李希霍芬是德国侵占胶州湾的主谋之一。而地质学家翁文灏在肯定李希霍芬“对于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及地文之观念，其伟大之贡献，实无其他地质学家足与伦比”的同时，敦促民国政府成立了地质研究所，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地质调查。

在中国的地质学学术界，对李希霍芬的评价基本是积极正面的。李希霍芬首次系统地论述了地表形成过程，研究了土壤形成因素及其类型，系统阐述了中国地质基础和自然地理特征，提出中国黄土风成理论，他还首先提出了“五台系”和“震旦系”等地层术语。在中华大地处于地质调查完全空白的情况下，他的考察及其成果更显得极其宝贵。李希霍芬作了很多开创性研究，为日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李希霍芬其人及其宏著《中国》在中国地质学界确有相当的历史影响，毕竟在我国地质事业萌芽时，曾起到了启蒙和借鉴作用，这是其不容抹杀的历史贡献。但是，他来华进行的地质考察，在德国侵占中国的主权、掠夺资源的过程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这就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背景下的备受争议的李希霍芬与《中国》。

在特定的历史境界中，李希霍芬的调查活动让他不可避免地握住了一把双刃剑，一面是开创性学术研究带来的崭新气象，一面是殖民者掠夺野心发出的闪闪寒光。